



七位革命前辈 的故事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石仲泉 陈登才 主 编
冯世平 沈丹英 副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七位革命前辈 的故事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石仲泉 陈登才 主 编
冯世平 沈丹英 副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位革命前辈的故事/石仲泉,陈登才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9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9)

ISBN 978-7-5098-0796-5

I. ①七… II. ①石… ②陈… III. ①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7731 号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0mm×203mm 1/32

字 数:90千字

印 张:5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796-5

定 价:10.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82517687

目录

CONTENTS

吴玉章的故事	1
李先念的故事	13
徐特立的故事	48
谢觉哉的故事	66
林伯渠的故事	86
董必武的故事	107
张闻天的故事	136

吴玉章的故事

吴玉章，名就珊，号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乡一户农家。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参加了包括1911年广州起义等多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教育工作。

吴玉章的一生，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这些事迹虽然本身平平常常，说起来也好像很琐碎，但是，一个人的人品、道德、境界，一个革命家的本色，正是靠这些平常而琐碎的事迹来体现的。

不恋官位

有些人虽没有才能，但钻营有术，当了大官。这种人因动机不纯、思想不正，一旦大权在握，往往祸国殃民。吴玉章一生的行动准则是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并不贪恋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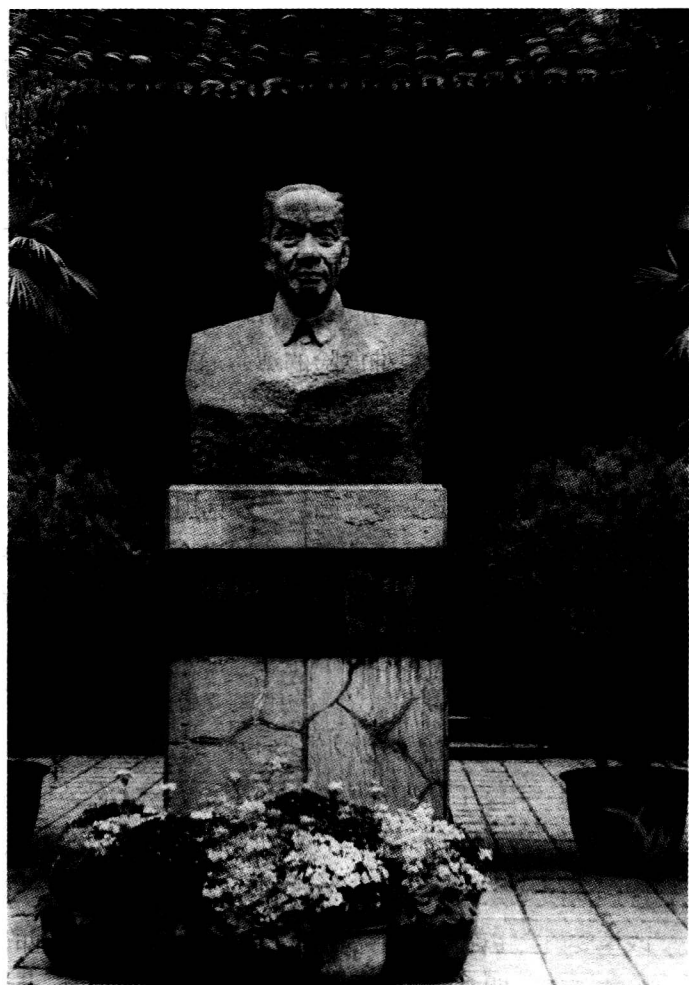
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大官”了。1925年国民党“二大”时，他是大会秘书长。1926年当选为国民



■ 吴玉章。

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参与主持军政大计。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五人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对抗。吴玉章是五人行动委员之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如果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就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只要他愿意听从汪精卫或蒋介石，捞个国民党中央常委当当，凭他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不会有问题。但是，他不愿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毅然选择了生死难测、充满艰难危险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的队伍里，他愿做普通一兵。

吴玉章勤奋地为党工作，显示了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在党内的职位慢慢升高，代表党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解放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等职，并曾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1949年后，除了曾任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他的职位一直不高。解放初期，担任的职务是华北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来的行政职务也只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的一些部下、朋友想不通，觉得共产党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打下了天下，怎么安排副主席、副总理的人选时，竟要照顾那么多的民主人士、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



■ 吴玉章故居。

来的人？胆大的，甚至跑到吴玉章面前嘀咕，说您只担任个大学校长，连高教部长都不是，真替您委屈。

吴玉章又是怎么想的呢？他对那些好心的部下、朋友讲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他的想法。他说：“干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就是丢了国民党的大官不当去干革命的。现在打下天下，很光荣。但管天下就要有天下一家的思想，一切要看对革命有没有利。只要对革命有利，个人当不当官有什么呢？现在党叫我筹办中国人民大学，这就是很大的信任和光荣，我要能把这个大学校长当好就很不错了。”

不贪钱财

“有钱能使鬼推磨。”拜金主义者把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吴玉章却不是这样。他一生清廉自守，把钱财看得很淡很淡。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与钱财打交道的时候不多，但要中饱私囊还是很容易的。1908年的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策划的两次武装起义。起义所需的军火，全由吴玉章等人在日本购买，有时要冒着生命危险。当时已有做买卖拿回扣一说，吴玉章只要稍做手脚，在这两笔大的买卖中弄点回扣，过上富裕的日子不成问题。但他连这种想法都不曾有过。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革命事业的胜利，哪能盘算个人的荣华富贵！

吴玉章因工作关系，免不了经常要与金钱打交道。

但为了革命事业，他常把自己的钱掏出来。

1940年，他在筹办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经费不足。为了把学校尽快创办起来，他决定将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为他举行60大寿时各单位赠送的珍贵金银纪念品及凡是能换成现款的东西都贡献出来，交给学校的工作人员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兑换成边币3000多元，交给了学校。

在与钱财打交道方面，吴玉章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那是1946年夏天，吴玉章在重庆做统战工作。一天，他正在看信，忽然对身边的同志笑道：“嘿，我活这么大岁数，居然钻出个‘父亲’来了！”大家感到很奇怪，接过信一看，只见开头写着“玉章吾儿……”信的内容很惨，大意是说：这家有个名叫“吴玉章”的儿子被抓走当壮丁去了，一直没有音信。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几个弟弟妹妹又小，耕牛也死了。加上衙门催捐，连年又遇饥荒，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过不下去了。不久前听人说，“玉章”在外面做了大官，这才托人写信，要求儿子赶快寄钱回家维持生活，最好多寄一些钱，好作为家人来重庆的路费。信的落款是河南省某地。

显然，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叫“吴玉章”的人的，大家觉得好笑，说信是通过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还是退给《新华日报》吧。吴玉章没有这样做。这天晚上，他伏案疾书，给那位河南农民写了回信。信中

写道：你们通过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信已收到了。你们两位老人不要生气，因为你们找到了我，我这个吴玉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实在不是你们的儿子。请你们不要悲伤，不要着急。因为你们抚养的儿子参加了抗日战争，八年抗战有很多人流血牺牲，但抗战终于胜利了，流血牺牲也就算有了代价。作为抗日军人的父母是光荣的，胜利了，人民也有责任赡养他们，照顾他们。……我在重庆不是在当官，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现在人民要求和平，不愿再打内战，我就是在为争取和平作奋斗。我相信只要能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你们的儿子是能够找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会渐渐好起来的。随信寄点钱去，暂时解决两位老人的困难，以后再有困难，可就近找我们的同志帮忙……

为写好这封信，吴玉章费了不少的心思。晚上还让警卫员核算了他几个月来的伙食费，把余钱寄给了那位素不相识的河南农民。

艰苦朴素

1940年冬，吴玉章因劳累过度，卧床不起，并一再休克。党中央很关心他，将他的孙媳吴本清调到身边照顾他。吴本清在清理衣物时，发现吴玉章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一套西服是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中山装是出席国民参政会时组织上给添置的，一件黑色的老羊皮大衣又重又臃，是滕代远将军送的。其他就

是一些又破又旧的土布衣服了。

吴玉章在饮食方面也与一般人没有两样，连一只鸡、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说要留着待客。解放战争期间，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年纪大，身体不好，工作又很紧张，背着 he 偷偷地为他把饭菜做得好一点。他吃饭时，总要问这样菜多少钱一斤，那样菜多少钱一斤，并批评说：“目前处在战争时期，一切都要从支援前线出发，厉行节约，不能因为我给国家增加负担。现在党和人民都有困难，而且大家生活都很艰苦，怎么能花那么多钱来改善我个人的生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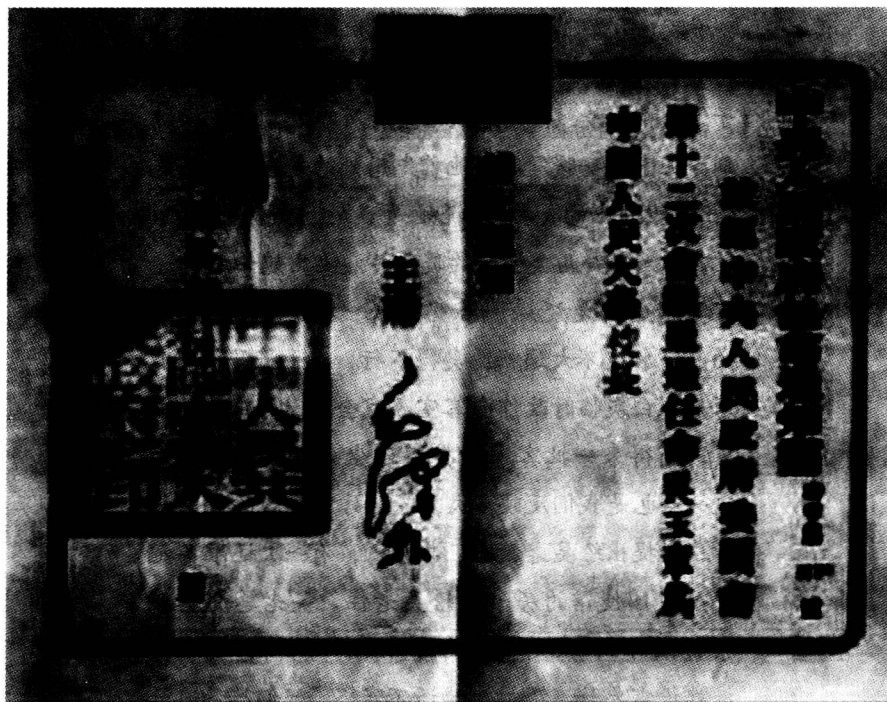
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物质匮乏，吃穿差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解放后，条件相对来说好多了，吴玉章生活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曾回忆说：

吴老在吃的方面毫不讲究，不喝茶，不抽烟，不饮酒，每餐饭弄什么菜他吃什么菜，餐后征求他的意见，他总说好，好。稍微好一点的东西，就想着大家。1950年除夕，办公厅送了些野味来，吴老说这是中央的关怀，亲自主持分割，分后派人给胡锡奎、成仿吾、李培之等校领导送去。剩下的一部分，也要把身边工作人员等齐了才吃，没到场的特别分出留着。穿的方面，延安带出的洗得泛白的衣服，还经常穿，衬衣、衬裤补了又补。一件小皮袄坏得再不能穿，他就叫改成护膝，晚上看文件时

用来搭在腿上。他女儿为他添置了一床小薄绒被，还挨了老人的批评。用的方面从来没有超过标准，偶有稿费收入，吴老还叫退回去，说吃穿用都是公家包了的，写稿子也是份内的工作嘛。一支钢笔笔尖粗得写字像毛笔，还是我们说了好几次才换支新的。一次，我们把吴老一块用了多年的旧表给换了，他还生气，说还可以用嘛。住的地方是过去的老房子，日照很差，室内光线又暗又有些返潮，晚上特别冷。可是安暖气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李培之同志（王若飞烈士的夫人），说她是烈属，要先行照顾。他自己只叫安两个屋子的暖气片，他儿媳妇和孙子们的宿舍都是烧煤。浴室是从一处大厕所隔出来的，下水道不太通畅，臭得不行。至于将另一间旧房刷点白灰临时改作会客室，完全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省得来一批客人后挤得连坐处都没有。就是这一点也是我们反映多次，吴老才同意修的。办公厅几次提出给吴老换车、换房子，有一次还准备把一处外国使馆的房子让给吴老住。吴老总说现在条件很好了，比延安、比西柏坡村好多了，现在经济建设需要钱，百姓生活还不富裕，我们尽量地给国家节约吧……

吴玉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们也毫不娇惯，同样严格要求。

他惟一的儿子吴震寰是著名的水电工程师，1949



■ 中央人民政府给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任命书。

年成都解放前夕，不幸在华西医院因病逝世。当时，儿媳一人拖着4个孩子在成都生活，十分困难。这些孩子最大的八九岁，最小的还不到半岁。吴玉章忍着老年丧子的巨大痛苦，决定叫他们母子到北京来共同生活。儿媳带着孙子到北京后，他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为了不增加国家负担，家属一律到隔壁校部大灶食堂吃饭，带小孩去吃如果不方便，可以给他们买个饭盒打回来吃，但不能与他同吃，也不准在他的小厨房内单独做饭菜，以免占公家的便宜。第二，家属有事外出，不准随使用他的小车，可以到外面大街上去乘电车。电车费可以从他的津贴费中开支，不能拿到公家财务上去报销。小孩子上幼儿园也不得用小车去专门接送。吴玉章解释说：小孩子从小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如果每个小孩家长每次都派小车接送，不但浪费国家汽油，而且在群众中还会造成不良影响，群众会说我们和旧社会一样，一人当官，全家享福。更严重的是使小孩子从小养成一种骄傲自满、盛气凌人的恶习，这对他们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吴玉章的女婿是1933年被军阀杀害的，他的惟一女儿从此寡居。解放后，他把女儿、外孙接到北京，在生活上也要求很严。外孙蓝其邦刚到北京，吴玉章就对他说：“我们有两重关系，一是同志关系，一是长辈与后辈关系。封建社会讲夫贵妻荣，封妻荫子，共产党是不讲这一套的。我们都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你们工作得好是你们的功劳，我工作得好是我

的努力。可以互相鼓励，但不能有所依附。不单是你，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能用我的名义在外面去办什么事。”

吴玉章说到做到。三年困难时期，他女儿已经60多岁了，他还要她回四川荣县老家去参加生产劳动。外孙蓝其邦有一次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信笺写信，他看到了，就把越南胡志明主席给他写的信让外孙看，原来胡志明主席使用的信封是用旧报纸翻做的。

吴玉章一生艰苦朴素，从严律己律人，难道他天生就愿意过清苦的生活么？不是的。他认为：生活与广大群众拉开了距离是很危险的。“国民党为什么原来受人民欢迎，以后又被人民反对呢？就是因为它腐败。……生活太优裕了，容易滋长特权思想，这好比硫酸，用得好它是催化剂，用得不好它就是腐蚀剂。”

李先念的故事

战火青春

李先念，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9年6月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12岁起学木工。从青年时代开始投身革命，参加过黄（安）麻（城）起义。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任区、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1931年10月起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委，率部参加过很多重要战役，为创建鄂豫皖边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2年夏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顽强地抗击了国民党军队26个师再加5个旅，约30万兵力长达4个月的“围剿”。至10月，位于湖北、河南、安徽边界的鄂豫皖边根据地中心区，大部分土地已被敌人占领，红军处境十分危险。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主力部队撤出根据地，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10月11日黄昏，浓浓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大别山区。四姑墩的一个小山坡上，站着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